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中国文学史

(修订本)

(四)

游国恩等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中国文学史（修订本）

（四）

游国恩 王 起 萧泽非 主编
季镇淮 费振刚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七编 明 代 文 学

概说	3
第一章 三国演义	13
第一节 章回小说的产生	13
第二节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14
第三节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17
第四节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22
第五节 三国演义的影响	28
第二章 水浒传	30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30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32
第三节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44
第四节 水浒传的影响	51
第三章 明前期诗文	53
第一节 宋濂 刘基 高启	53
第二节 台阁体和茶陵诗派	59
第四章 明代的戏剧	63
第一节 明初到中叶的戏剧	63

第二节	昆腔的兴起和浣纱记、鸣凤记	68
第三节	沈璟和吴江派	70
第四节	徐渭和明中叶后杂剧	73
第五章	汤显祖	76
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	76
第二节	牡丹亭	78
第三节	汤显祖的其他剧作	83
第四节	东郭记、红梅记及其他	87
第六章	西游记	91
第一节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91
第二节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96
第三节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	102
第七章	金瓶梅及明中叶后其他长篇小说	108
第一节	金瓶梅	108
第二节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	112
第三节	封神演义和其他神魔小说	116
第八章	明代的拟话本	120
第一节	冯梦龙与三言	120
第二节	二拍及其他	126
第九章	明代散曲和民歌	129
第一节	王磐及其他散曲作家	129
第二节	冯惟敏及其他散曲作家	133
第三节	明代民歌	136
第十章	明中叶后的诗文	141
第一节	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141

第二节	归有光等唐宋派	145
第三节	李贽	149
第四节	公安派和竟陵派	152
第五节	明末爱国文社和爱国作家	156
小结		161

第八编 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

概说		167
第一章 清初诗文词		175
第一节	顾炎武等爱国作家的诗文	175
第二节	清初的诗派和诗人	184
第三节	清初的词派和词人	191
第二章 清初戏曲作家		194
第一节	李玉和他的同派作家	194
第二节	清忠谱	197
第三节	尤侗和其他戏曲作家	200
第四节	李渔和他的戏曲理论	202
第三章 洪昇和长生殿		206
第一节	洪昇的生平和作品	206
第二节	长生殿故事的继承和发展	208
第三节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209
第四章 孔尚任和桃花扇		216
第一节	孔尚任的生平和作品	216
第二节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218

第三节	昆曲衰落时期的传奇、杂剧作家·····	224
第五章	聊斋志异·····	229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和作品·····	229
第二节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232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239
第四节	聊斋志异以后的文言短篇小说·····	244
第六章	清初至清中叶的长篇小说·····	246
第一节	水浒后传、说岳全传及其他·····	246
第二节	醒世姻缘传及其他·····	252
第三节	镜花缘及其他·····	256
第七章	儒林外史·····	261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	261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262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268
第八章	红楼梦·····	274
第一节	红楼梦的作者·····	274
第二节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	277
第三节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288
第四节	红楼梦的影响·····	295
第九章	弹词鼓词和民间歌曲·····	298
第一节	弹词和鼓词·····	298
第二节	民间歌曲·····	303
第十章	清中叶的诗文·····	307
第一节	乾嘉间的诗派和诗人·····	307
第二节	桐城派古文及其他·····	315

第三节 汪中及其他骈文家	318
小结	321

第九编 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

概说	325
第一章 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	334
第一节 龚自珍	334
第二节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诗文	344
第三节 古典小说的衰落	350
第二章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诗文	354
第一节 “诗界革命”和黄遵宪	354
第二节 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家	360
第三节 宋诗派及其他诗文流派	368
第三章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小说	372
第一节 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372
第二节 李伯元和吴趼人	377
第三节 老残游记及其他	384
第四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	388
第一节 章炳麟、秋瑾等革命作家	388
第二节 柳亚子及其他南社诗人	396
第三节 孽海花及其他	405
第五章 近代戏曲	411
第一节 地方戏的发展和京剧	411
第二节 传奇、杂剧和乱弹剧本	414
第三节 戏剧的革新及话剧的萌芽	418

第六章 近代民间文学	422
第一节 民间歌谣	422
第二节 传说故事	427
小结	432
阅读书目	437
后记	456
再修订后记	458

第七编

明代文学

(公元 1368—1644 年)

概 说

明太祖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方割据势力以后，一三六八年即皇帝位，随即派大军扫荡山东、两河，直取大都（北京），逐步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朱元璋慑于“民急则乱”的历史教训，斟酌历朝统治制度上的利弊得失，在经济上移民垦荒，注意兴修水利，实行军屯，减轻赋税，使元末战争中逃亡的人口，重归家园，广大地区进一步封建化；同时又解放工奴，简约商税，扶持工商，从而使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极力巩固皇权统治，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设立六部尚书。于是军政大权揽于一身，这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为巩固皇权统治，又大肆杀戮功臣。洪武十三年，兴胡党大狱，加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凌迟处死。该案延续达十年，“坐诛者三万余人”（《明史·胡惟庸传》）。洪武二十六年又兴蓝党大狱，指大将军蓝玉谋为不轨，凌迟处死，“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明史·蓝玉传》）。到了永乐以后又建立内阁制度，同时重用宦官，司礼监有时替皇帝批公文。宦官还搞特务组织，主要是侦察大臣的言行。在文化思想上实现了严酷的控制，对封建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朱元

璋曾亲自筹划,开设文华堂招揽人才。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他们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元璋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功课,并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中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明书·学校志》)。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在积极提倡理学的同时,又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朱元璋和刘基定八股文程式,专从四书五经命题,并只能依朱注解释,所谓“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统治者除了上述笼络、利用的手段外,还对文人采取了高压政策。洪武年间规定“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诗人高启就因辞官被腰斩,苏州文人姚润、王谟被征不来,都被斩首抄家。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的前后十三年中,朱元璋又不断地大兴文字狱。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以为故意讽刺他作过红巾军,嘲笑他和尚出身^①,立即将他们斩首。在这种封建淫威之下,文人为免于惨祸,谨小慎微,一时成了风气。

明开国以来一百多年时间内,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则处在恢复、发展时期。正因为这样,封建统治者所实行的统制文化思想的措施,就更容易收到成效。

① 朱元璋视士大夫若仆隶,认为文章中“则”为“贼”同音,“增”为“僧”同音,“光”与僧有关,都是有意讥讽。

明前期文学一些优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杰出的作家施耐庵、罗贯中在水浒、三国故事长期、广泛流传和有关的话本、杂剧刊行的基础上，写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在明代三百年间，特别是中叶以后，它们越来越赢得人民的爱好，从而引起了一些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文人的注意，加以增删、评点，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并继续产生了不少以它们的故事为题材的戏曲、说唱文学等作品。宋濂、刘基、高启这些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由于经过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到了广大的现实生活，对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一定认识，因此也写出了一些揭露现实黑暗，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但从明开国以后的一百多年中，文坛上是比较黯淡的。这时期在文学作品的整理方面倒做了一些工作，如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加工，章回小说和传奇戏的体例的不断发展和趋于完善，为中叶后文学创作的繁荣准备了一定条件。至于诗文创作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有成就的作品。当时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自称宗法杜甫而追求声调格律的茶陵诗派。

明代到了中叶弘治(孝宗)、正德(武宗)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的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农村中的土地兼并也非常剧烈，从皇帝以至诸王、勋戚、官僚以及豪绅地主、富商大贾都凭借特权，大量兼并土地。如武宗即位后，大建皇庄，把大片土地分赐给贵族和宦官。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之下，失去了他们

仅有的一点生产和生活资料,被迫逃亡。因此,流民问题成了明代中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规模的流民起义相继出现。但同时流民的大量流入城市,也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这时纺织、冶铁、制盐、造船等手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到了嘉靖、万历年间,不仅纺织、采矿、冶铸等行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就是以前不甚发达或根本没有的行业如造纸、印刷、制糖、轧棉等,也有了迅速的成长。其中印刷行业特别发达。嘉靖、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的极盛时代。万历时期的南京已成为大量刊行小说、戏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这为当时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在这时期也有了普遍的改进和提高,并逐渐形成了地区之间的专业分工。官场手工业的主要地位,已为民间手工业所代替。当时除了家庭手工业外,还出现了手工业工场。一些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就靠手工业生产发财致富,他们为发展商品生产,积累更多财富,在扩充生产设备的同时,尽量雇用工人生产。《醒世恒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施复就是在十多年间由一个家庭小手工业者逐渐上升为工场主的一个例子。在苏州,当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织工、染工就有一万余人。他们必须在机户所设的工场内作工,才能获得工资维持生活。据《万历实录》说:“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很清楚,其中机工与机户的关系,已经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占有者的关系。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主要是东

南沿海一带的纺织业中已经出现了,这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中的崭新因素。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相适应,商业更趋繁盛,商品流通也更加扩大。当时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如东南的苏、松、杭、嘉等处,随着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的大发展,逐渐成为繁华的都市。江西的景德镇,既是瓷业生产的中心,又是贩瓷的中心。在这些手工业、商业繁盛的都市里,市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也在不断增长。

弘治、正德时期政治腐败和特务统治严重。武宗本人除了在宫内奢侈淫乐外,还四出巡游,所至劫掠财物,抢夺妇女,以至“市肆萧然,白昼闭户”。武宗时宦官刘瑾在原有的东西二厂之外,又设立了内行厂,分遣喽卒,四出刺事,一人有事,全家被累,邻里皆坐。统治阶级内部藩王和中央之间的矛盾也非常突出。安化王以讨刘瑾为名,声称“特举义兵,清除君侧”,后九年宁王据江西起兵,声言直取南京,其势更大。到了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政治危机继续发展。世宗即位之初,虽颁发了一些所谓改革武宗弊政的诏旨,但很快就在一些权贵的攻击下“收回成命”,随之,弊政又复层出不穷。世宗经年不朝,迷信道教。当时内阁纷争剧烈,改革派和权贵保守派互相斗争,形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在严嵩父子执政的二十多年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些正直的官吏相继被迫害而死,这些情况在当时出现的文学作品中有明显反映。嘉靖末年,社会上已经呈现了一个军政败坏,财政破产的局面。到了隆庆、万历年间,封建统治者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挽救政治危机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当时出现了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

派,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诸如:澄清吏治,平均赋役,制止兼并,清理土地,清查边军积弊和巩固国防等等。这些措施对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封建统治起了一定作用。但到了万历中期之后,改革派又逐渐被排斥。当时以神宗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腐朽不堪。臣下说神宗是酒色财气四病俱全,非药石可治。为了满足无度的挥霍,他又陆续向各地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盐税使,到处掠夺,从而引起了各地人民的反抗。这时一些作品中所出现的反暴君倾向就是当时现实的反映。上层统治集团荒淫的生活,直接影响到一般的官僚、地主,也使整个社会风气趋向堕落。在这时一些小说、戏曲中所出现的大量色情的描写,就是深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万历后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东林党和邪党之间的斗争。邪党到了天启年间转为阉党,首领魏忠贤把持朝政,大批杀害东林党人,这就使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继起的复社,和东林党一样既是政治团体,又是文学团体,它继续和阉党作斗争,一直到明亡,成为明中叶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对当时文学创作有不小影响,明末清初有不少作品就直接反映这种激烈的党争。天启、崇祯年间最高统治者又通过“辽饷”、“剿饷”、“练饷”等名目,横征暴敛,使人民倾家荡产,到处流亡。加之水、旱、饥馑、疾疫等灾害不断发生,从而引起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明王朝覆灭。

中叶弘治、正德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从挽救社会政治危机的意愿出发,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王守仁的“良知”说以陆象山的“心即理”的学说为前提,

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王文成公全书·文录·与王纯甫二》）。肯定“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并解释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文录·书朱守乾卷》）。因此，只要取消欲望，自求内心，就可以获得这种良知，并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就它的实质来说和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一样，都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但也应看到它们之间是有矛盾的，王守仁哲学中的“心即理”和程朱理学中的“性即理”的观点有其对立的一面。王守仁反对理学那套束缚人性的教条，他曾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传习录》下）。正因为这样，王学对动摇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有它一定的作用。嘉靖、万历年间，随着经济上新的发展变化，思想界也出现了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他们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的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王艮认为“良知”是平易的，非玄妙的。又认为“圣人之道无易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黄宗羲《明儒学案》、《心斋语录》）。王学左派后期代表人物李贽被当时人称为“异端”之尤。在他的重要著作《焚书》中，猛烈地攻击了封建礼教，他认为穿衣吃饭就是道，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他还大胆反对假道学将儒学神化，提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所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李贽《李氏藏书·纪传总目前论》）。虽